



杏林文史资料

中国
厦门市杏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厦门市杏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杏林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杏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杏林文史资料》

第五辑目录

〔革命风云录〕

- ✓ 杨衢云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 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1)
- ✓ 乘风破浪红旗扬 渡海解放厦门岛
——访支前一等功臣杨大炮……………
…………… 陈海龙(26)

〔创业史绩〕

- ✓ 十度春秋大潮动……………
——杏林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十年回眸
…………… 杏林区外资局(30)
- ✓ 杏林第一长堤——杏林海堤…………… (36)
- ✓ 同祥小学创业史…………… 庄温颜(39)
- ✓ 厦门第二化工厂的发展历程……………
…………… 邱思奇(44)

迅速发展的新明达..... (46)

正新——海峡西岸展拳脚..... (49)

两岸共打“中华牌”

——厦杏摩托创业记..... (51)

建设中的“中亚城”..... (53)

〔史海钩沉〕

同安县志有关杏林历史记载

..... 政协文史委 (56)

〔文物古迹〕

许厝古窑址..... (90)

钟山隐圣“石峰岩寺”..... 傅建河 (91)

登瀛“月台”遗址..... 陈海龙 (94)

明代胡元轩墓..... (96)

神医吴李的民间传说..... (97)

将历史前推五千年的一瞥

——海沧打制石器发现始末 (110)

慈济宫的木雕和彩画 方文图 (114)

游海沧森林公园 柯明哲 (117)

海沧的江嵩铁路 陈海龙 (120)

杨衢云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中山大学历史系 李吉奎

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早期活动中，杨衢云(1861~1900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是辅仁文社的社长，又是香港兴中会的第一任会长。由于他参加领导广州重阳起义，参与策划惠州起义，1900年11月(编者注：应为1901年1月10日)，被清吏所派刺客击伤毙命。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虽然说十分短促，但却是民主革命早期史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杨衢云原名合吉，又名飞鸿，字肇春，号衢云，福建海澄人(今厦门市杏林区霞阳村)。衢云年青时在香港某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断右中三指，乃改习英文。后在香港湾仔国(皇?)家书院任教员，旋任招商局总书记(按即主任秘书——引者)，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陈少白称其“素有大志”。^①冯自由亦谓“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②浓厚的国家民族意识，使杨衢云感到有必要结

交同道，结社救国。实践活动使他成为辛亥革命运动史上较早的资产阶级革命者。1892年3月13日，杨衢云、谢纘泰结合陈芬、周昭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五人，成立“辅仁文社”。这个组织，还不具备反清革命性质，“大体上还是一个致力‘新学’和社会活动的研究团体”。^③这个组织以杨、谢二人为核心，杨为会长。

1895年1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准备在广东发动反清起义。原辅仁文社的成员，杨、谢及周昭岳三人加入了兴中会。在香港兴中会组织中，孙中山结交、联络的人员占了主导地位。冯自由《兴中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记香港入会者十人，其中属孙派者为陈少白、杨鹤龄、尤列、陆皓东及区凤墀；属杨衢云派者有谢纘泰、黄咏商、周昭岳，余育之接近杨派。在广州兴中会中，入会者廿六人，除丘四、朱贵全外，皆由孙及孙派之人所联络。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制定章程，发展组织，统筹大局，在广州，组织起义队伍，设立机关，筹集军饷。在香港，孙与杨衢云等人多次会议，商议起义计划，攻取方略，联络外人。孙来往省港之间，是兴中会的事实上的领导人。^④当然杨

衢云作为兴中会重要领导者之一，也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他驻港专任后方接应与财政事务，筹集军饷，购运军械，以及联络会党。陈少白说杨衢云胆小不愿到广州来冒险，这大概不是事实。广州方面的工作一向由孙中山经手，杨不熟悉；相反，杨在香港久居，关系熟稔，活动方便。杨留在香港的决定是在阴历九月初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出的。会议还决定，九月初八（1895年10月25日）晚上，由杨带三点（合）会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广州预备好的人便马上动手。据载，孙中山将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交给了杨，由杨最后带来省城。这次会议还一致通过选举孙中山当总统。总统一词，英文是 president。中文译成“伯理玺天德”。美国史扶邻（H. ZSCHIFFRIN）教授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根据薛君度教授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所引刘成禺的言论，认为“有证据表明”，这时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坚信共和主义”。^⑤这种评论是偏颇的。文献证实，早在1895年3月孙中山向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寻求援助时，即申明革命成功后将建立共和国，而由谁任总统，则未决定。^⑥这是3月13日会议决

定重阳起义后的结论，并非杨氏坚决而孙中山则有所犹豫。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因杨衢云对“伯理玺天德”一职的重视，从而导致兴中会会长已经选定而改易，这可能是香港兴中会内部的一次重大纠纷，尽管它以孙中山的大度而得以和平了结。

陈少白记述，香港最后一次会议后，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中山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以后到省城，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孙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精神上也就受了一个很大打击。他于是约郑士良、陈少白商量。郑很冲动，说非要去杀了杨不可。杀人就出了人命案件，便暴露了计划，孙中山接受了陈少白建议，答应杨的要求。当晚开会，孙中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会议表决通过。次日，孙便到广州去了。^⑦谢纘泰的记述是，1895年10月10日，“杨衢云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策划准备袭取广州。”谢氏注：“杨衢云当选总理，孙逸仙博士大不高兴。这事常使他耿耿于怀。1896年10月12日，黄咏商（黄胜爵士次子）强烈谴责孙的无能时表示：‘我将来要与孙断绝关系。’”^⑧参照各种记载，

孙之所让，应是会长与总统职务，而非“临时政府”总理。冯自由《杨衢云事略》中，认为杨之要求，坚欲得总统，谢纘泰等复拥戴之”，此举实际上是有派系背景在里面。正是考虑到这种因素，孙中山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才表示谦退，衢云由是当选。

史扶邻教授认为，“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孙中山都不是广州密谋的无可争辩的领导者。这个位置被杨衢云所据有：“杨衢云的经历及人品和孙中山是这样的相似，以致在起事前夕，他有足够的威望和影响充当挂名的领导人。”^⑨既然是“挂名的领导人”，就不能说是“在名义上”或“事实上”的“无可争辩的领导者”。杨衢云提出要求时，也并非他是“无可争辩的领导者。”至于史扶邻说“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最后依从杨衢云的要求，是因为杨控制着运动的财政”，杨衢云承担筹款的部分责任，他与捐款人黄咏商、余育之都比较接近，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孙中山历来是亲自控制运动的财政的，前述香港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孙中山将香港存款及军械交给杨衢云，便可说明。何况，在这个时刻，已不可能再从事财政运动了。所以，杨之任兴中会“挂名的领导人”及拟

议中新政权的总统,从孙中山方面来说,是从大局出发,讲求团结,全力以赴,是正确的举措。

广州起义的密谋,在10月26日(九月初九)之前,因参加者之一朱淇(檄文的起草者)的哥哥朱湘的告密,已为官方所悉。尽管粤督谭钟麟不太相信,但孙已被县丞李家焯所监视。26日早,孙在广州的队伍已经集结,但香港的人械并未抵达,即杨衢云未能在香港准时作出安排,26日凌晨,他给孙发出电报,称“货不能来”,要推迟一天即27日晚运到。孙中山等人意识到,既然不能按期举事,只能无限期推迟,于是即刻电告杨衢云“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同时遣散了广州的队伍。但是,杨接电后,仍在27日晚令香港人械上船,无从阻截。将夕,衢云复电谓:“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广州当局已接到包括港英方面通知等各种情报,派兵在码头等待保安轮的到来。28日晨,南海知县李徵庸、县丞李家焯率队在码头堵截,一共被捕去丘四、朱贵全等40余人,余众散去。装在七个敏士桶内的左轮手枪200余支亦被发现。或许是估计到危险性,杨衢云并未如原计划赴广州。重阳起义,没有发

动便失败了。

史扶邻教授指出：“尽管杨衢云在香港的作用后来成为内部争论的问题，但英国有关这个事件的详细记载，却充分证明杨衢云是很自觉地去执行这个最困难的使命的。”^⑩即说是，从招募三合会员充“苦力”内渡，到运送军械，都是在港英警方知情之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充满了危险。但是，杨衢云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接电制止内渡之后仍让四百名招募来的人员上船，而不是就地遣散。总之，从失败原因的检讨来说，孙、杨双方都要承担责任，三年后杨衢云在东京受到批评而无异词，可以表示他承认自己确实犯了错误。

港英警方在运械事件暴露后，便缉捕杨衢云。杨也被广州官方列入追捕名单之中。但杨逃走了。据说，此后他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各埠，所至皆设兴中会分会，以南非约翰尼斯堡、彼得马尼士堡二处为成绩最优。因缺乏史料，其具体活动难道其详。说所经之处皆设兴中会分会，似不确切。颜清湟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便断定杨在新加坡并未设立兴中会分会，认为“当杨氏短期途经新加坡时，为了扩展兴中会在南洋的革命力

量，他即与这些当地私会党人约会接触，颇有所获。此行虽然未能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兴中会分会，但杨氏对当地华侨社会的影响力量显然是有的。”（见李恩涵中译本，第54页）陈少白说杨在南非生活颇为优裕，其东返时，且有一位黎姓先生携资陪其赴日本。杨之所以赴日，据陈少白说，是他听到孙中山在日本确有巨资（二三百万元），预备再革命。不论其动机如何，是希望与孙会合，从头开始。

1898年3月11日，杨衢云乘日船抵达香港海面，与谢纘泰会晤，谢告以他与康广仁会谈合作之事，劝他组织革命，注意与各地会党合作。随后，杨偕眷赴日，于3月21日抵达横滨，并与孙中山、陈少白见面。关于这次见面时孙杨间的谈话，陈少白有一段记载：“孙先生说：‘我当时真恨极了，我责问他当日的的事情。我说：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期，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消息泄漏；人又被杀了。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是什么把戏？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说来，不然，我是不能

放过你的!’杨衢云俯首无词,最后他便说:‘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错,现在闻得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故此赶来,请你恕我前过,容我再来效力。’”云云。^①事情便这样过去了。此后,杨在横滨开了一间书馆,以教授英文过活,并参加孙中山一派的活动,与保皇派一边讲合作,一边又进行斗争。从谢纘泰所留下的资料来看,杨与梁启超的往来系受指示于谢氏,而与孙并无直接关系。众所周知,谢纘泰并不是一心一意支持孙中山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独立于孙自行活动,且对孙颇有中伤之词。据谢自述,1898年4月18日,他向杨衢云建议推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此举意在推倒孙中山的位置。

1898年11月24日,杨衢云致函谢纘泰,“信中通知说,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据谢氏记述,他还写信给康、梁,劝告合作,1899年3月28日梁启超复函中表示“赞同我(指谢)提出的联合和合作的主张。”4月23日,杨函告谢纘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不过,杨在与梁

启超会谈(地点是横滨冯镜如的经塞尔洋行办事处)之后,6月6日给谢纘泰函中对合作则表示不甚乐观:“他(梁启超)劝告我努力继续做好我们党的工作,而他将努力继续做好他们党的工作。现在他还不愿意同我们合作,康有为党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正如胡礼垣先生在《新政安衡》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懂得正义是什么,我曾经听到好几位博学的湖南人对他们作过类似的评述。”杨衢云与谢纘泰通信频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杨虽以教授糊口,对革命活动仍持积极态度。杨在7月27日写给谢的第32号信中,“信内附有革命宣传品多份,这些宣传品已经广泛散发,鼓动中国人民起义,反对满州强盗。”在8月29日发的33号信中,谢写道:“这些革命‘鼓动宣传品’已用中国合众政府的名义,寄发给美洲、檀香山、澳洲、海峡殖民地、曼谷、西贡和加拿大的党人。”10月28日第34号信,更讲到“长江流域各省和世界其他地区党人的工作顺利进行。杨衢云还抨击并揭露康有为的人‘保皇会’。”^⑫杨衢云与梁启超商谈合作,事实上难

有进展。一方面是杨在日本并非以兴中会会长身份活动,人们只承认他是孙派的一员,要与革命派商谈大计,除孙中山本人外,他无所属,故尽管谢纘泰再三促使杨与康派人士谈合作、联合,这仅是一厢情愿之事。另一方面,杨衢云在横滨,一直参加孙中山方面的活动,孙并未摈弃他。¹³ 孙与梁启超商谈合作,继续地进行,无大成效。与之并行的,是革命与维新两派,在旅日华侨中围绕争夺大同学校、华商会议所领导权在进行激烈斗争。这些斗争,可从日本文献中看出其大略。据 1899 年 1 月 24 日神奈川县知事致外务大臣的报告,在 15 日至 19 日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选举大同学校董事的纷争,“改革派则欲改变该校之名称、职员及教员等,并改变其组织,使之逸仙主宰,成为清国革命派之机关。”又谓:“目前侨居的清国人,依其政治党派来分,一为孙逸仙派,即清国革命派,属此派者有陈璧(白)、杨飞鸿以及侨居清国人中处于中等以下水平七十余名;另一派为康有为派,即清国改革派。两派互争势力。此次大同学校职员选举竞争之发生,实出于政治上的原因。”¹⁴ 同年 8 月 4 日神奈川县的另一则报告,是关于横滨华商会议所议长、干

事选举，因为梁启超一派所把持，有“横滨閩人不平人”书写公启，指责其事，为杨衢云等人被排斥于会议所之外鸣不平。8月11日，犬养毅特地由东京赴横滨召集两派调解，参加调解会的有孙中山、杨衢云、鲍昆、林北泉及另外三人，在住吉町六丁目千岁楼进行。^⑮上述两桩事的纷争，均以孙派失败告终。两派分歧是如此深刻，孙中山当然清楚合作问题难有成功之可能，所以一直未停从事革命的活动。

1899年秋，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协调之下，长江流域哥老会的代表到达香港，与三合会郑士良、兴中会陈少白，举行会议，成立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这样，孙中山便成为全国反清势力公认的革命“中锋”。在此情况下，杨衢云仍拥有兴中会会长名义，便不利于革命进行了。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乘船抵达香港。据谢纘泰记述：“杨衢云告诉我，孙逸仙博士已经要求他辞去党的领导，以便让给孙领导。这事使我很惊奇。他说：不久前我们几乎分裂成两党，这是很危险的。有一天孙逸仙博士告诉我，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并且暗示说不可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新职位，那我就必须独立工作。

我向孙逸仙表白，我十分愿意辞去我的职位，并且劝告他不要鼓励分裂。我同时告诉他，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位了。我说我们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我也告诉他，只要在他的领导下运动能成功地进行，我是不理会谁被推选为会长的。孙先生要求我问你是否赞成这个改变，是否承认推选他为会长。”谢纘泰表示：“为了防止党的分裂，我劝杨衢云辞去会长之职，把它让给孙逸仙博士”。但他又认为，“杨衢云的职位孙逸仙博士篡夺了”，“我不赞成孙逸仙博士的高压行为，我决定独立行动。”^{①⑥}

关于杨衢云辞香港兴中会会长职务一事，冯自由所记不同，时间是在毕永年与哥老会龙头诸人有联合全国各秘密会党推孙中山为首领之议传出后，衢云辞退兴中会会长职，并荐孙中山自代，而后有兴汉会成立，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之举措。^{①⑦}职务改变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只要名实相副，有利革命进行，都是应该肯定的。

先是，1899年，孙中山得到菲律宾彭西的支持，用一笔款子，令陈少白返港，办《中国日报》（1900年1月25日发刊），以广宣传，并以